



# 日本政治史

## 第三卷

〔日〕信夫清三郎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509644



2 030 3438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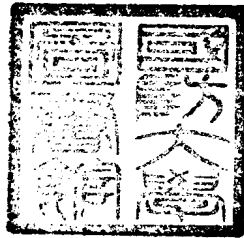
# 日本政治史

## 第三卷

(天皇制的建立)

〔日〕信夫清三郎著

吕万和 熊达云 张 健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3

# 日本政治史 III

天皇制の成立

信夫清三郎 著

---

根据日本南窗社 1980 年版译出

## 日本政治史

第三卷

〔日〕信夫清三郎 著

吕万和 熊达云 张 健译

---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 × 1156 1/32 印张 1.375 字数 305,000

1988 年 2 月第 1 版 198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7-5327-0243-X/K·006

定 价: 4.25 元

## 凡 例

一、叙述方法按照第一卷的凡例。

二、关于民选议院或选举等词的表述，在明治时代是不固定的，有时使用“选”，有时使用“撰”。本卷除1874年的《民撰议院设立建议书》这种固有的表述外，在引用文献时，亦基本统一写作“选”字。同样，“洲”和“州”，除西乡隆盛的“南洲”外，都统一写作“州”，“附”统一写作“付”。

三、本卷，在句子的末尾常常标有“？”。“？”大致分为三种用法。第一是单纯的疑问符号，由于不能确定事实而表示“不明白”。第二是自问自答的符号。本卷第五页第二段“日本的贵族干了些什么呢？”是自问，第三十页第五段的“岛津久光……”以下是自答。第三是表示假设。自第十七页的最后一行到第十八页的第一行“难道民治不是以切身的感受注视着这种村民生活的混乱的吗？”就不是单纯的疑问符号，而是表示一种大概如此的假设。由于没有可靠的资料能够说明杉民治的真实意图，因此避免用肯定的词语，而以假设方式来表达著者“谅必如此”的见解。

本书是我以通史形式叙述近代日本政治史的四卷本《日本政治史》的第三卷。本卷主题是天皇制的建立和“国民”(Nation)的形成。

十九世纪意大利独立运动政治家阿塞利奥<sup>①</sup>曾大声疾呼：“我们创造了意大利，现在我们必须创造意大利人！”(博伊德·C·谢菲尔著《民族主义的诸面貌——新现实与旧神话》，收获书店1974年版，第11—12页。d'Azeglio “We have made Italy, now we have to make Italians”)。

明治维新的课题也一分为二：创立“日本”与形成“日本人”。前者是民族革命的课题，即建立与万国对峙的中央集权“国家”；后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课题，即为了利用人民的创造性和全体意见支持这个国家，从而实行改革以形成“国民”。

创立与万国对峙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一课题，如果追根溯源，恐怕要以培理来航前夕作为开端。当时，在海防争论中已从政策思想方面提出了集结“国内全体之力”、“日本全国之力”、“整个国家之力”、“统一和睦之力”等的必要性。海防争论产生于怎样对付西欧冲击的政策争论，并因培理来航而达到了高潮。如果再向前追溯，则应以对付西欧冲击已上升到政策思想高度之时为开端。宽政四、五年间(1792—1793年)，老中松平定信在接待俄国使

---

<sup>①</sup> 阿塞利奥(Azeglio Massimod, 1798—1866)，意大利政治活动家和作家，主张在萨瓦王朝统治下统一意大利，曾任皮蒙特内阁首相和外交大臣(1849—1852年)。

节拉克斯曼之后，看到了“蛮国精通事理”而开始搜集“红毛<sup>①</sup>之2书”，即其发端。虽然定信没有那种立即把“兰书”<sup>②</sup>付之“公用”的热情和抱负，但他看到了“蛮国精通事理”，并开始搜集兰书。这就表明当权者已为对付西欧冲击采取了最初措施。

重新估价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江户时代，把它看作近代的先驱时代，这种努力是最近学术界的一大特色，而此在文化领域中尤为显著。美学者濑木慎一指出：“把连续长达二百七十年的德川政权时代，在文化史上笼统地看作一个时代是不妥当的。”他强调说：“室町末期至元禄时代繁盛起来的近世初期文化，最多至十八世纪后期尚有几分影响。此后，新型文化就异军突起了。”他敦请人们注意，“从美术史上来说，明和二年(1765年)春信<sup>③</sup>发展锦绘<sup>④</sup>，使浮世绘<sup>⑤</sup>版画出现了绚丽的色彩，这时已是新旧更替时期”，而“春章<sup>⑥</sup>、清长<sup>⑦</sup>、歌麿<sup>⑧</sup>、荣之、写乐<sup>⑨</sup>等人活跃的天明、宽政时代到十九世纪初的文化、文政<sup>⑩</sup>时代，情况已完全改变”。他得出结论说，如果“把一个时代的人们感觉所及范围规定为近代”，那么“原来划为近世后期的时期，确切地说，称作近代初期也许更为合适”(濑木慎一著《江户后期文化的再认识》，《朝日新闻》1974年6月5日)。在文学家前田爱主持召开的“幕末文学”

---

① 红毛，特指荷兰人，泛指西洋人。

② 兰书，荷兰文之书，泛指洋学。

③ 春信，即铃木春信(1725—1770)，浮世绘画家，锦绘的创始人。

④ 锦绘，彩色浮世绘版画。

⑤ 浮世绘，日本的一种民间绘画，大都描写人情世态、下层社会，始于十七世纪初，盛于十八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末渐趋衰落。

⑥ 春章，即胜川春章(1726—1792)，江户中期浮世绘画家。

⑦ 清长，即鸟居清长(1732—1815)，浮世绘画家，擅长美人画。

⑧ 歌麿，即喜多川歌麿(1753—1800)，江户后期浮世绘画家，擅长美人画。

⑨ 写乐，即东洲斋写乐(生卒年不详)，俗称十郎兵卫，江户中期浮世绘画家。

⑩ 文化、文政时代，又称化政时代，时在1804—1872年。

座谈会上，就思想史家野口武彦所提出的“广义的幕末开端”问题展开了讨论。其中，比较文学家芳贺彻作了如下发言：

“说到日本的思想，在对事物的思考方式、感觉方式的大潮流中，在到处出现与以往方向迥异、矢量①不同的时代，……我感到，似可把那以后叫做文化史和精神史上的幕末时期乃至日本的近代时期。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所谓的兰学者开始出现，根据内心的要求，把目光转向西方科学，直接阅读兰书。在他们的视野里，西洋的文明开始大量涌现，而中国的世界则相对地成为地球上的一部分。一方面，在把中国文明变成相对的文明这一点上，国学经常与兰学携手合作，而其自身也异常倔强地勃然发展壮大；另一方面，……且不用说茶山②、六如③等新感觉派的汉诗诗人相继涌现，上方的芜村④、上田秋成⑤、江户的平贺源内⑥以及大田南亩⑦等剧作者，也以紧密呼应的形式，创造出了一个堪称浪漫主义的新的诗文世界。

“这种变化，例如在儒学中也已出现，但不限于儒学一家，在其它新的学术领域以及文艺世界、美术世界也同样发生了许多变化，事实上在众多方面各自的才能已开始发挥。所以，按照海辛

---

① 矢量(Vector)，即“向量”，数学名词，既有方向又有大小的量。

② 茶山，即菅茶山(1748—1827)，江户后期的儒学家，汉诗诗人，名晋帅，通称太仲，号茶山，著有诗集《黄叶夕阳村舍诗》等。

③ 六如(?—1801)，名慈周，号无著庵、葛原、白楼，江户中后期天台宗的著名学问僧，工汉诗，著有《葛原诗话》等。

④ 上方的芜村，上方指京都及畿内地区，芜村，即与谢芜村(1716—1783)，江户中期俳人，画家，有《芜村七部集》和《野马图》等。

⑤ 上田秋成(1734—1809)，江户后期的国学者、歌人、小说家，著有《雨月物语》等。

⑥ 平贺源内(1729—1779)，江户中期本草学者、剧作家，著有《风流志道轩传》，《神灵知渡》等。

⑦ 大田南亩(1749—1823)，江户后期狂歌师、剧作家，为狂歌三大家之一，著有《万载狂歌集》等。

哈<sup>①</sup>的话来说，就是各种文化活动不是一花独放，而是结成一体，互相促进地开始行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前后，是趋向被称之为幕末的时期，也可以说是日本人的精神状态开始崩溃之时。一言以蔽之，与这种“崩溃”相适应，各种才能相当自由地，一方面以浪漫主义的形式，另一方面又以民族主义的形式开始新的探索。我认为，这种时代应当称作幕末的开端。（《日本文学座谈》第十一册，幕末文学，学生社1977年版，第91—92页）。

政治史的分期与文化史的分期并不一致。因为政治史的分期，尤其与当权者的意志有关联。但是，如果说“文化活动结成一体，互相促进地开始行动”，那末老中松平定信懂得“蛮国精通事理”并开始搜集兰书，也处身于这种文化活动的潮流之中了。文化史上划作“幕末开端”的时期，政治史上也可以划作“幕末开端”时期，虽然两者有发自内心与来自外界之别，也有时间上的参差。

政治史上的幕末维新史，是作为政治斗争而展开的。自从老中松平定信的意志决定以后，靠何种政治势力以及用何种形式来抵挡西欧的冲击，由谁以何种方式创立与万国对峙的集权体制，换言之，由何种政治势力来承担创立集权国家，这便是政治斗争的中心课题。文政七年（1824年）常陆大津滨发生的事件<sup>②</sup>又增加了一个课题。这起事件表明庶民并没有把西欧的冲击看成是冲击，尚未具备与西欧冲击相对抗的“国民”意识。会泽正志斋在大津滨事件后的第二年撰写了《新论》，曾在幕末时期风靡一时，使许多志士奋起，这就充分表明了那起事件的重要性。庶民的同样操行，在元治元年（1864年）马关战争中更加显露。这样，幕末维新史肩负着创立“国家”和形成“国民”的双重任务。“国家”的创立，自庆

① 海辛哈(Johan Huizinga, 1872—1945)，荷兰历史学家，著有《中世纪的秋天》等。

② 1824年，英国捕鲸船员在常陆大津滨登陆，要求供给柴薪和淡水，水户藩予以拘留，后释放。

应三年(1868年)的“王政复古”——建立朝藩体制以代替幕藩体制——发展到明治二年(1869年)的“奉还版籍”——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形成国家的土地所有制以代替领主的土地领有制——而开其端绪,又依靠立足于启蒙主义的西欧化和近代化的政策——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文明开化——进入到正式的国家建设阶段。本书第二卷的中心是叙述立足于启蒙主义的国家建设,本卷继第二卷之后,将继“日本”创立之后而形成的“日本人”提到了议事日程,把叙述的重点放在描述日本政治史的特殊形态,即:在“国家”的建设以天皇制的确立而结束的过程中,“国民”(Nation)的形成则成了“臣民”(Subject)的形成。

“国民”的形成被提到议事日程是在明治五年至六年。当时,赴美欧考察的木户孝允,在波兰接触到亡国的人民,很受震动,回国后便于明治六年七月和九月草拟了关于制定宪法的意见书,强调以国会为媒介来统一人民的必要性。明治七年,陆奥宗光向木户提交了关于批判有司专制的意见书,其意见书恰好以“日本人”为题。木户提出的“国民”的形成发展为“臣民”的形式,这一过程与下面的过程相呼应: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所描绘的“君民共治”(立宪君主制)设想,在与同样要求“君民共治”的自由民权运动的对抗中,屈从于伊藤博文所设想的“立宪君治”(立宪绝对主义)。伊藤博文凭借大日本帝国宪法实现了天皇制的制度,山县有朋则凭借教育敕语宣布了天皇制意识形态。两者都描绘出了立宪君主统治下的“臣民”的形象,而臣民的观念则在天皇的权威随着日清战争的胜利而提高的过程中扎根于人民之中。自由民权运动要求形成“国民”,“有司专制”则要求形成“臣民”,两者斗争的过程,同时也是形成国民的要求与对国家建设(文明开化)的批判提出“第二次维新”的过程。但是,当国民的形成变成臣民的形成,

5 当日清战争使臣民意识在人民中扎根之时，第二次维新的要求也就在日清战争中流失，资产阶级革命终于流产。

如从最广义的范围来看，明治维新是为了对付西欧的冲击而建设与万国对峙的国家，同时也是形成国民的过程。它始于当权者——德川幕府的老中松平定信——首次把对付西欧的冲击作为政策而提出的十八世纪末的九十年代，止于十九世纪末的九十年代，具有长达约一世纪的历史。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明治政府以确立天皇制和形成臣民的方式解决了国家建设和形成国民这个双重课题，并进而凭借因日清战争的胜利而确立的天皇权威，使臣民的观念在人民中间扎根。其中，有直到王政复古以前的前史，有从王政复古到奉还版籍的过渡期，有自奉还版籍开始的正史，正史之中又有建设国家和造就国民的阶段。如果最狭义地看待明治维新，那它就是为时约两年的政治过程，包括从庆应三年(1867)以民族革命为主题的王政复古至明治四年(1871)废藩置县为止的三次政变，下接以国家建设为主题的明治二年(1869)至明治六年约五年间的历史，其间有几年和民族革命过程重迭<sup>①</sup>；继之以明治六年(1873)至明治二十七、二十八年的日清战争，约二十年间的历史；再进而连接自日清战争至明治三十七、三十八年(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即形成帝国主义的时期。本卷第一章至第四章的四章叙述明治六年至日清战争的时期，第五章叙述自日清战争至日俄战争这两次大战期间帝国主义的形成过程。

日本的帝国主义问题，与所谓“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或“军事、绝对主义、封建帝国主义”问题有关，是历史学界所争论的重大课题。争论的开端是所谓“志贺、神山论争”。形成志贺、神山论争开端的，是神山茂夫在《人民评论》1946年11月号发表《何谓军事

---

① 此句据第四卷勘误表补入。

封建帝国主义》一文，批评我在同年4月号《经济评论》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日本帝国主义的终结》。此后，我在名古屋大学的《日俄战争的研究》（河出书房，1959年）上发表论文，题为《（日本的）日俄战争研究史》，触及了这一问题。我接受了小山弘健与浅田光<sup>6</sup>辉合著《日本帝国主义史》（第一卷，青木书店，1958年）一书中的说法。他们下定义说，日俄战争时天皇制“‘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政权代表了部分资产阶级的早期‘帝国主义’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是‘双重帝国主义’战争”。我在《（日本的）日俄战争的研究史》一文中说，小山氏的理论中，“似乎有一把解决关于日俄战争性质争论的钥匙”。但是，无论是对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还是对双重帝国主义，都有重新加以认识的必要。

列宁最早提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这一概念。他在1915年撰写的论文《社会主义与战争》中阐述说，“但是一般说来，在俄国占优势的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最新型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沙皇政府对波斯、满洲和蒙古的政策中，完全显露出来了，把沙皇制度对“大多数居民”实行史无前例的“压迫”这一事实，当作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问题加以指出<sup>①</sup>。列宁在1915年时提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问题，其意图是为了揭露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民族压迫”的“帝国主义战争”中的“非常反动的反解放的性质”。列宁在同年1915年撰写的论文《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中，则指出了“俄国是各族人民的监狱”这一事实，说“沙皇制度具有军事封建性质”<sup>②</sup>。1916年，列宁在《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这篇论文中又指出，“俄国即使在平时时期，在更加野蛮的、中世纪的、经济落后的、军事官僚式的帝国主义基础上也打破了‘民族压迫的世界记录’，提出了开展‘为受沙皇制度压迫的民族的分

① 译文参照《列宁全集》第2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版第285页。

② 译文参照同上书，第392页。

自由斗争”<sup>①</sup>。显然，列宁在阐述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时，是把俄国当作“各族人民的监狱”，作为揭发沙皇制度实行甚至“打破了民族压迫的世界记录”的“中世纪的”统治的概念而使用的。日本的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包括我自己——没有理解列宁使用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这一概念的真实意图，也没有分析沙皇制度统治下的俄国  
7 已成了“各族人民的监狱”这一实体，只是把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一味地理解成沙皇制度的“政权”，或者理解成是沙皇制度的“对外侵略性质”。事情难道不就是如此吗？把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等同于沙皇制度的是斯大林。他在1924年发表的论文《论列宁主义基础》中阐述说：“列宁说得对，沙皇制度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sup>②</sup>。

列宁所说的对于满洲“最新型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沙皇政府……的政策中，完全显露出来了”，指的是什么时候呢？它大概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的观察吧。日俄战争对于俄国来说，难道不同样也是“最新型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战争吗？库罗帕特金在担任陆军大臣时，对1900年发生的义和团事件主张“无论如何要把满洲变成布哈拉”，企图军事占领辽东半岛（《维特伯爵回忆录——日俄战争与俄国革命》，大竹博吉译，1931年，上册第197页）。布哈拉汗国是俄国于1876年在中央亚细亚作为保护国而建立的。维特指出，库罗帕特金后来“决心把中国变成布哈拉并终于谱写了日俄战争的序曲”。但是，沙皇政府对满洲的侵略，“就整体而言”，是在维特以法国帝国主义的“高利贷”资金为后盾，利用国家资本铺设的中东铁路轨道上进行的。假设库罗帕特金要把满洲变成布哈拉的主张表现了军事封建帝国主义，那么，在侵略满洲中，难道不也是“最新型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占优势”吗？很明显，在日本

---

① 译文参照《列宁全集》第22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版，第354页。

② 译文参照《斯大林全集》第6卷中译本，第67页。

是“最新型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占统治地位，它使日俄战争具有“最新型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

关于日俄战争当时的日本，如果说它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那它应该是就天皇制对琉球民族的统治而言的。就是在颁布了宪法和开设了国会之后，日本也未给琉球人民以参政权，民族歧视令人侧目，以致民权论者谢花升在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发了疯。虽然琉球民族——冲绳县民——不久后获得了参政权，但在此前后，即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日本帝国主义又排除朝鲜民族的激烈抵抗，强迫推行“日韩合并”。对此，列宁在大正九年（1920年）向俄共莫斯科组织活动分子演说时指出：“为争夺世界霸权、掠夺权利而战”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正在“把一切最新的技术发明和纯粹亚洲式的刑法结合在一起，空前残酷地掠夺着朝鲜”。<sup>①</sup>如果列宁论述日本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那这不正是揭露了在天皇制的统治下，“把沙皇政府的一切办法，一切最新的技术，同纯粹亚洲式的刑法和空前的残暴行为结合起来了”吗？日本帝国主义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为了称霸世界”而开始征服整个亚洲。领导着抗日战争的毛泽东在其发展壮大的1938年所作《论持久战》的讲演中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所推行的战争的“特殊野蛮性”是“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企图称霸世界的日本帝国主义自身终于把光荣的“明治国家”引向失败，本书下一卷将主要叙述这一过程。

信夫清三郎

1980年5月16日

---

① 译文参照《列宁全集》第31卷中译本，第404页。

## 目 录

|                |     |
|----------------|-----|
| 凡 例 .....      | 1   |
| 序 .....        | 1   |
| 第一章 西南战争.....  | 1   |
| 第二章 自由民权.....  | 74  |
| 第三章 宪法与议会..... | 154 |
| 第四章 日清战争.....  | 229 |
| 第五章 日俄战争.....  | 300 |
| 索 引 .....      | 376 |

## 第一章 西南战争

3

戊辰之岁，日本变更政府，推翻德川政府而兴王室。由是，可谓为近时我日本国中一大变更也。然而，此变更乃政府与政府之变更，即仅与统治者有关而与我人民无关，既毫未增进人民之幸福，亦未有益于人民；权力既未增加，自由亦未增进。且今日人民之状况已无需如今之独裁政体。开化之程度固已可适于立宪政体，国民之愿望实亦在于立宪政体。要之，今日更需第二次改革，改革其政体为君民共治，废政府之独裁而使人民执掌政权可也。

——《论希望明治第二次改革》

（载《海南新志》第五号，1877年9月22日）

\*

\*

\*

法国革命始于贵族的叛乱，而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则始于士族的叛乱。

法国革命始于贵族的叛乱。法国的革命史家阿尔贝尔·索布尔在叙述法国革命的开端时指出：

“1789年之前的几年是社会危机的年代,当时由于王权在财政上的无力和自我改革的无能,严重的政治危机在发展。也就是说,每当具有革新精神的大臣企图使国家近代化之时,贵族阶级就要起来维护自己的特权。贵族的反抗先于资产阶级革命,早在1789年以前就使王权动摇。”

法国大革命前夜的危机,在法国于1775年支持美国独立战争之后更加深重。法国财政总监芮克靠公债筹措军费,却由此而出现庞大的财政赤字,导致财政破产。1781年,芮克辞职,卡隆继任,此后,危机迅速加深。企图消灭财政赤字的增税早已达到极限,要实行增税,就必须向迄今为止一直免除纳税义务的贵族和神职人员(僧侣)征税,实行对一切人同等课税的新办法。1786年,卡隆向国王建议实行财政改革,企图向“特权”进攻,实现赋税平等。国王召开了早就存在的显贵会议,它是一个集中显贵的咨询机构。由国王指名参加的有高级神职人员、大领主、高等法院议员、地方总监、国务顾问官、各省三级会议及城市自治体的成员等共一百四十四人,于1787年2月齐集于显贵会议。但是,他们不与卡隆合作而企图维护自身作为特权者的特权。4月,卡隆辞职,由大主教布里昂接替。但是,要解决财政危机,布里昂除了采用卡隆的办法外,别无他策。5月,布里昂解散了显贵会议。高等法院继显贵会议之后继续抵抗。第二年即1788年5月,掌玺大臣拉穆瓦尼翁提出进行司法改革,以粉碎高等法院的抵抗。统治着高等法院的司法贵族,为了维护贵族的特权,向所有贵族和神职人员发出呼吁,企图挑起反对国王的叛乱。“贵族的叛乱”(révolte nobiliaire)——如果把与贵族一道起来的神职人员包括在内,就是“贵族的革命”(révolution aristocratique)——开始了。高等法院散发手册和传单,使鼓动性的表示他们抵抗国王意志的启蒙思想家语言——市民(citoyen)、法(loi)、祖国(Patrie)、宪法(constitution)、国民

(nation) 等等——流行于街头巷尾。布里昂向贵族的叛乱屈服，约定于7月份召开三级会议。8月，决定把召开三级会议的日期定在1789年5月1日。接着布里昂辞职。国王重新召回芮克。芮克中止了拉穆瓦尼翁提出的司法改革。革命史家索布尔概括了贵族叛乱的结果，指出：“贵族阶级取得了胜利，但是，贵族的反抗虽使王权受挫，但由于过分动摇了王权，反而为资产阶级革命开辟了道路。”1789年5月5日召开的三级会议，使贵族、神职人员、第三等级之间的斗争爆发。6月17日，第三等级把三级会议改称为“国民会议”，开始把贵族的叛乱转变成资产阶级革命。

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始于士族的叛乱。日本的贵族干了些什么呢？

\*

\*

\*

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不断追求的“根轴”还没有确定下来。他们追求的“根轴”就是把天皇培育成政治君主，就是要拥立辅佐天皇的宰相，就是要消灭由藩阀所造成的有司(官僚)的宗派主义，总之是要把绝对主义的统治构筑得固若金汤。

可是，天皇还生活在传统之中。天皇不懈地举行祭政一致的祭祀。十八世纪在普鲁士实现开明专制的弗里德利希二世既把国家与国王分开，宣称身为国王的自己为“国家第一等高级官员”。日本天皇还没有成为可以宣布自己为“国家第一等高级官员”的政治君主。日本启蒙绝对主义的志向是要象普鲁士一样，实现“制度化的绝对主义”，处于绝对主义顶峰的天皇，作为传统的君主脱离了启蒙的绝对主义。天皇还沉迷在宫廷旧习之中，在其传记资料《明治天皇纪》中记有一段逸话，是1873年3月天皇根据“散发令”<sup>①</sup>

<sup>①</sup> 散发令，即“散发脱刀令”。1871年9月23日，太政官发布告示，准武士自由散发，不佩带刀，以消除武士阶层的外观标志。